

上海6000年 第169-170期

晚明上海士人代表王圻陈继儒的另类选择

熊月之认为：江南地区经济发达，除入仕做官外可编书写书求实学

10月26日下午，文汇报讲堂169-170期“上海6000年(上海文明探源工程:贯通古今向未来上海6000年)”在闵行华漕镇王圻故里·赵家村鹿鸣苑苑举办，主题为《史学大家王圻与晚明上海士人陈继儒——晚明上海士人的民本思想与创新开放》。上海文史馆馆员熊月之担任主讲，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古代史主任叶舟、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室主任凌利中应邀对话。央视视频、文汇报视频号、喜马拉雅

雅、方志上海、今日闵行视频号现场直播。本期讲座由文汇报社、上海博物馆、上海地方志办公室联合主办，中国文物学会文化遺產传播专委会协办。文汇报讲堂和上海滩大讲堂双冠名，承办方为上海通志馆、闵行区华漕镇政府。

整理:李念 摄影:周文强 版式:李洁

嘉宾主讲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相对集中于晚明时期上海地区的文人生活，他们的思想、文化、风貌的一些特点。历史上凡是称为“晚”的阶段，都是一个较长的时段，通常政治变动比较剧烈、社会矛盾比较突出，有时是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产生，并与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发生激烈冲突的时代，普遍故事繁多。中华大地幅员广大，区域发展差异性很大，晚明上海地区既有共性又有个性。

晚明上海文人典范王圻、陈继儒

以两位上海地区的文人作为典型，一是王圻(1530-1615)，二是陈继儒(1558-1639)，两人生活的年代加起来几乎是晚明的72年，即从万历元年1573年始至崇祯末年1644年，占据明朝的1/4。其中，万历明神宗占48年，天启明熹宗、崇祯明思宗共占24年。从中能够看出当时上海地区的文人生活状况、思想与文化特点。

中举、中进士早晚对仕途的影响

王圻35岁中举，36岁中进士，做官预热、自我感觉良好的阶段极短，这使得他踏上仕途以后格外谨慎。按张仲礼先生的研究，古人中举平均年龄为31岁，中进士平均年龄为36岁。比王圻小的徐光启，37岁中举人，43岁中进士。王圻家境还算富裕，但并无较高社会地位，这为他了解社会实情做了很好的铺垫，入仕后开始做知县、知州一类基层官员较为得法。反观上海松江府的名人徐阶，20岁中进士任翰林，因年轻气盛诸多碰壁后才磨练出老道，官至首辅大学士。因此，王圻36岁走上官场相对幸运。

王圻为官共20年，治学30年。他退休时才56岁，说明其正值壮年尚可继续攀登，朝廷擢升其半级赴陕西就任，并不表明其仕途黯淡，但王圻毅然决然辞官退休，归乡治学，这是他的自

主选择。

王圻为官：两地建生祠，不站队逆风独立

王圻在江西、河南、山东、四川、云南、湖广、福建等地，分别担任过知县、知州、监察御史、按察使、学政等职，都是比较基层的职位，与社会底层接触广泛。他做官有几个特点：

第一，忠心为国，体恤民情。古代监察御史是言官，专门给皇帝反映问题并享有免责特权，即使道听途说或无法证实之事也不问责。但王圻并未滥用该特权。仔细阅其奏文，有几类上疏。一类是举贤荐才。王圻会以自己的考察为依据，指出某人一心为国而举荐，或某人徇私谋利而弹劾，因此，他的上疏被采纳率很高。另一类是为朝廷大政方针提供基层民情，参与国家治理。特别有一类是借天意示警，比如直隶、湖广、山东等地频发地震、蝗灾、水灾，他便请求皇帝遵旧典、修实政以图兴革。由此看出，他真诚为朝廷考虑，从基层搜集信息，并及时向上层反映，上思报国，下思利民。

第二，深入实际，勤政慎明。古代的知州、知县同时也是法官，王圻办案颇多且处置得当。因为他深入了解辖地现实和历史，所以判决果断、处理公正，被誉为“循吏第一”，这是极高的评价。江西清江、河南开州两地百姓都为他建立生祠。

第三，果断干练，能力超强。有时处理复杂问题需要非常高明的本领。比如福建籍地村民聚众数千焚劫乡里，且为害颇久，难以剿灭。王圻仔细分析后，一方面赈济无助之人，另一方面大张旗鼓抓捕强盗首恶，压下去。对胁迫之人并未按照惯例格杀勿论，而是放回乡里，复为良民。这就化解了矛盾，地方暴乱很快平息，受到当地人普遍赞誉，也得到朝廷嘉奖，大家一致认为他富有行政才干。

第四，清廉正直，独立不苟。清廉不贪，相对容易做到，但要独立不苟则颇不易。王圻为官之时是万历年间，皇帝20多年不上朝，朝政为首辅大臣把控，纷争不断。当时，高拱和徐阶都曾任职首辅，高拱是王圻考



▲熊月之从心学角度，由点到面勾勒出晚明上海士人转向自我发展的面向。

进士的主考官，王圻是高拱门生；徐阶是王圻松江同乡，两人都希望王圻站队自己一方。王圻坚持底线，公事公办，私下还劝两位化解矛盾。王圻对待首辅张居正也是如此，因不愿站队而不被提拔，但又因推行“一条鞭法”有功被派至张居正家，后在“倒张”运动中又被视为张的同党而被排挤。

王圻治学：著述无所不包，实学中放眼世界

在治学上，我称其为史学大家，举世无双。

第一，视野宏阔，无所不涉。无论是被誉为第一本百科全书式图录类书的《三才图会》，还是各类史书的编撰，王圻均可谓通才，上自天文，下至地理，中到人事，包含政治、国防、经济、风俗、词语、各类植物、飞禽走兽，无所不涉。在他眼里，学问没有边界，能读的书和各种学问，都会涉猎。《神史汇编》中含有丰富的佛道知识，这与他自己对儒道释的深入理解不无关系。

第二，内容扎实，考订细实。王圻撰写的不少史书，有许多资料由其亲自搜集而来。编史书，需要总结前人的资料并归纳，这是一种功力和二次创作，意义非凡。王圻为官，不少与教育岗位有关，他非常注意积累各类史料，加上自己搜集所得，并将两者相比较。这特别体现在《东吴水利考》一书中。此书十卷，详说太湖地区水利问题。他不仅指出了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吴淞江等淤塞，水利官员被革等事，还建言松江一带首先要修治海塘，拆除沿海涂块的填筑等，然后浚治各条河流。这些与他自己的搜集考察密不可分。

第三，著述之丰，一时之最。王圻著述有多少呢？1100多万字，800多卷，24种。如果一本书30万字，这意味着他回乡近30年间，平均每年一本，这是无人能及的。许多有其独特贡献。比如《续文献通考》254卷，是马端临之后至近代以前唯一的私人撰述的典制通史，开创续“三通”之先河。后代编修均有官府背景，用现在的话说，这是一个重大国家项目。但王圻却以一己之力为之。他有两方面的能力，财和才，加上眼光，这三点使他贡献不凡。

第四，眼光独到，重视图像。《神史汇编》是笔记小说、各类传说、民间故事的汇编。当时甚少人认为这是学问，但到今天，民间故事是社会文化、民俗的反映，重要性不言而喻。

左图右书是中华文化传统，到宋

①“王圻故里展馆”一角：站在王圻书桌前，通过虚实模拟结合，体验“头顶日月星，脚踏九州土，眼盛千万相”
②9位现场听友获得提问类书籍，含《重写晚明史》《三才图会》《王圻传》

代因图画不在科举考内就不被重视了。《三才图会》就像一个大大蓄水池，把前人有关图的知识都汇集于此，成为集大成者，后人直至今日，要了解古代社会的图像知识，都要参考此书；教科书内帝王将相的画像也都出于此。明清之际，此书就在东亚地区广泛传播。

“民间宰相”陈继儒：编撰府志收录传教士

陈继儒比王圻小28岁，21岁已是生员，之后没有考上举人，29岁毅然退出科举道路。30至47岁，主要在一些名人家当私塾老师，比如徐阶。后来隐居松江一带，包括小昆山、佘山，专攻琴棋书画，无所不通。

他既有才华，又能处理各类事务，因此，许多朝廷高官真心诚意推荐，邀请他出山做官，他一概拒绝；友朋邀游政治之事，他通常回避，不卷入朝廷纷争。他认为有意义的是致力于经世之学。崇祯年间的《松江府志》总纂便是陈继儒。崇祯年正好处于改朝换代之际，矛盾较多。我仔细看过《松江府志》，内有许多内容描写底层百姓。比如织布家庭如何购买棉花、织布、售卖；熬盐人如何生活，细致至极，远超过杜甫对民间疾苦的描述。

因为他关心社会底层，救济灾荒，需要时必定出力，被人们称为“民间宰相”。方孝孺是明朝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被誉为“天下读书种子”，因为辅佐建文帝实施新政而被称为“帝师”。1402年，因拒绝为日后成为明成祖的朱棣草拟即位诏书而被施以极刑并诛十族，史称“靖难之役”。其后流落到松江府，1609年方孝孺被平反后，后裔要求建纪念馆。这些事都需要经过详尽调查，陈继儒是主要实施者，他在《求志书院记》里将调查过程记得相当详尽。

在他主编的崇祯《松江府志》里，破天荒记录了传教士在上海地区的活动。说明他关心西学且思想开明。康熙年间重修《松江府志》时，有关传教士的材料都被删除了。

晚明上海士人一族

从王圻到陈继儒，加上大家都比较熟悉的董其昌、徐光启，这四个人大体可看出晚明时上海地区文人的走向。

汇编大书，关注民生实学为当时新风气

第一，勇于开拓，文化担当。王圻编《三才图会》《续文献通考》《神史汇编》等大型的类书，并非突发奇想，而是上海地区读书人的风气使然。比如，在王圻之前的陆楫(1515-

1552)就编有《古今说海》142卷，里面收录笔记、小说、杂记等，是对过去笔记小说进行分类的第一人。陆楫是陆深的儿子，上海陆家嘴因陆氏家族而得名。他有非常深刻超前的经济思想。

张之象(1507-1587)是龙华人，平时讲得比较少，曾任浙江按察司知事，他编《唐诗类苑》200卷，是唐诗分类编辑论领域时间最早、规模最大、体系最完备之作。后人研究唐诗绕不开此书。

再如世所熟知的徐光启编撰的《农政全书》60卷，是有关农书集大成之作。陈子龙等人编的《皇明经世文编》504卷，最能集中体现上海地区士风、社会发展。这些士人编书的行为，是对同时代众多读书人脱离现实、不关心社会底层的匡正。汇编大书在上海地区形成一种普遍现象，反映了上海地区文化人总体的文化关怀。图像与史书，都是中华文化积淀的成果，如无人系统加以总结、梳理，就无法在历史流传中得到新的发展，因此在文化建设方面，晚明上海士人承前启后，具有重要开拓意义。

第二，经世致用，民本思想。无论《古今说海》还是《神史汇编》，都是眼光向下，联系社会基层。现在经过考证，参加编辑《皇明经世文编》一共24人，都是松江文人。可见，晚明上海士人在经世致用方面，具有强烈的民本意识。

第三，视野宏阔，世界眼光。提到徐光启引入西学时，大家知道在晚明并非只有他一人。《三才图会》中已经用了利玛窦传进来的天文图像和地理地图，这两者此前中国读书人并不知晓。王圻生活年代比徐光启早三十多年，这反映两点：第一，他非常注意了解并吸收新知识，第二，思想非常开放，这就是世界眼光。陈继儒把传教士活动收录进《松江府志》，也是一种开明眼光。

第四，不迂不执，自主人生。凡是朝代晚期都会出现新文化、新风俗、新气象。王圻做官20年，归乡30年；董其昌仕途45年，实际做官18年，有27年以各种借口隐居从事绘画、写字，占据3/5年份，也因此留下了书画家地位，书画在博物馆传世。通常，董其昌被认为是更隐，一半在官，一半在学；王圻是半隐，做了一半的官回家地位，书画在博物馆传世。通常，董其昌被认为是更隐，一半在官，一半在学；王圻是半隐，做了一半的官回家地位，书画在博物馆传世。通常，董其昌被认为是更隐，一半在官，一半在学；王圻是半隐，做了一半的官回家地位，书画在博物馆传世。

江南谋生路多元，心学倡导向内拓展寻找自我

大家是否觉得这三人是特例？不是。晚明时期，不仅在松江府，在苏州府、常州府、杭嘉湖，都很普遍，学术界对此已有专门研究。为什么？

第一，江南富裕，谋生手段丰富。江南地区在宋代已是全中国经济文化

最发达之地了，文人谋生手段相对更丰富一些。第一给富裕家庭做家教，报酬不低。第二编书盈利。明代出版业发达，读书人多，买书人也多，编书、刻书、卖书这条产业链上，每个环节都能挣钱。第三是写东西。写小说、写剧本、写诗、画画，都能挣钱。明代四大奇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就是代表。第四润笔费。世人爱请有科举功名者如进士或文化名人写寿序、序言、墓志铭，邀请去各类仪式寿场，润笔费应该也不低。

第二，科举录取率低。明、清两代科举录取进士，实施地区分配。江南经济发达地区读书人多，参加科举基数大，录取率相对就低。有专门研究显示，明清江南考取进士的比例是100取1，有时120取1；内地、边远地区则15取1或20取1，因此就有徐光启做“移民考生”之举。江南发达地方读书之后99%的人不能做官，家里如生活无忧，就去写小说、画画、当老师，实在不行可从事旅游、园林设计、图案设计等。

第三，异地为官制度。明清政治制度设计中有回避规定，即异地为官。明朝对待官员比较苛刻，俸禄很低，有时还会被廷杖，缺少尊严。科举中进士能在社会上证明自己具备考取功名的能力，入仕后借口告假也是常事，朝廷也默许。因此，江南不少士人选择隐居。很多时候，江南在籍士绅，比在边远地区当官要舒适得多。

最重要一点，还是王阳明心学的影响。心学主张，任何道理都要经过自己的头脑思考认定才是道理，与程朱理学不同；心学认为“人人皆可为尧舜”，修行后谁都可成圣人。因此，像王圻、陈继儒、董其昌，对于仕途，他们内心里都有属于自己的思索与判断，虽然“学而优则仕”是儒家核心思想，但到晚明时不少士人也明白读书人应该有、也可以有其他发展途径。

陈继儒所写的《安得长者言》等家训作品，不仅内容仍然很有味道，销量至今不衰。他的经历告诉人们：向内拓宽自己的心灵世界，在其他方面同样可以成就一个了不起的人生。这个思想境界就有相当现代意义了。

晚明时代，你把王圻、陈继儒、董其昌、徐光启连在一起，会看到他们有许多相通之处，稍加分析就可看出上海地区确实有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这与日后的海派文化一脉相承。换句话说，这就是海派文化的滥觞。

